

延安时期是怎样学习的

□ 李雪铭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全党特别是领导干部的学习。延安时期，毛泽东、刘少奇、陈云等党的领导人以身作则，通过学习来提高本领，并逐渐建立起学习制度，形成了重视学习的优良传统，极大地推动了党内学习运动的深入开展，对于学习型政党的建设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为何学:自我提高与党的事业需要

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之所以由领导人带头在全党范围内积极开展学习运动，是面对新情况、新问题做出的战略选择。

一是干部队伍的整体素质有待提高。面对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形势新任务，不论是老干部还是新干部，工作中都有不同程度的不适应，党员干部的素质亟待提升。有的老干部革命意志坚定但缺乏必要的文化知识；有的老干部革命热情高涨，但实际斗争经验欠缺，等等。为了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学习成为摆在全党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

二是严峻的国内外形势和社会矛盾的客观要求。抗日战争爆发后，中日之间的矛盾变得更为凸显。同时，中国社会固有的多种矛盾也更加尖锐。在这种复杂的局面与形势下，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是诸多事关中华民族生死存亡和中国革命前途的大问题：如何正确认识和对待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关系，如何带领全国人民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等问题都需要党做出正确的分析和解答。因此，及时而又深入地推进学习活动，把马克思主义真正作为改造旧世界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使党更清晰、更客观地认识和分析中国革命的形势和实际问题，就成为当时党面临的迫切的任务之一。

学什么:经典著作和中外历史

延安时期党的领导人热爱学习、善于学习，并对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的重要性认识非常深刻。毛泽东酷爱读书，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下，只要一有机会便通过各种渠道搜集新近出版的马列著作，并设法找来认真阅读。他经常阅读的经典著作有《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反杜林论》等。根据在延安时期管过毛泽东图书的史敬棠回忆，毛泽东在延安时经常读列宁的《两个策略》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两部著作。从中央苏区出发，经过万里长征，他一直带着这两本书经常翻看，在书上作批注、写感受，并记住是第几遍阅读等信息。此外他还阅读了许多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论著，并且都是伴

随着深入思考中国实际问题而进行的。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为从理论高度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毛泽东开始专心研究哲学。他广泛阅读各类哲学书籍，认真汲取各种哲学流派的思想精华，把解决党的思想认识问题作为其哲学研究的出发点和着力点。陈云回忆说：“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同志提倡学马列著作，特别是学哲学，对于全党的思想提高、认识统一，起了很大的作用。”

刘少奇也大力提倡党的理论学习，强调历史里边有普遍真理。他主张应该很好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并用这些经验来教育我们的干部和党员。只有这样，才能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才能维护我们党的队伍的统一和纪律，才能保证我们党经常的正确的领导，才能在今后领导中国革命到达胜利。刘少奇提出不仅要学习中国历史，也要学习西方的历史，这样可以更深刻读懂马列主义，更清楚认清形势。

在毛泽东看来，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1942年3月30日，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作《如何研究中共党史》报告时强调要“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并把这种方法称之为“古今中外法”，要求我们不当割断历史，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份珍贵的遗产。因此在延安时期向全党提出了研究历史的学习任务，尤其重视对中国近代史的学习研究，毛泽东领导的中央学习组对历史的学习首先是通读《六大以来》，然后是全面研究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

怎样学:个人学习与集体学习相结合

刘少奇号召大家都要勤于读书学习，而他自己更是以身作则，带头学习、自觉学习，并且把读书作为一直坚持的一种习惯和信念。1939年底正是抗日战争十分危急的时期，刘少奇来到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张爱萍回忆当时深夜曾去看望他，当他进屋时看到的是刘少奇正在微弱的烛光下认真地读书，在他阅读的书页上画了很多蓝的红的圈圈点点，有的上面还批了字，刘少奇这种时刻读书学习的精神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

学哲学可以提高理论认识水平，把哲学思想用于革命工作中，可以不断提升实际工作水平。在毛泽东的带动下，学习哲学一度成为了延安的风尚。各机关创立了哲学研究小组，小组以新哲学报告会和讨论会的形式开展哲学的研习活动。张闻天在中央宣传部成立的学习小组，由于中央办公厅、中央文委等机关党员的参加，后扩大至一百多人的学习集体。中央组织部也成立了一个学习小组，由陈云任组长，李富春任副组长。该组重点学习哲学，把《唯物史观》作为小组学习的教材，规定每天上午在九点之前是自学时间，每周组织一次集体讨论。同时，在延安的一些学者如和培元、艾思奇、吴亮平等还经常举办哲学演讲，演讲的内容包括军事辩证法、实际生活中的哲学问题、中外哲学史方面的知识、哲学方法等等。所有这些，大大激发了党员干部学习哲学的兴趣，大幅度提高了领导干部的理论水平和工作能力。

陈云十分重视开展学习活动，并积极组织党内的学习活动。陈云几乎每次都亲自主持小组学习会，开会前他会首先询问每个同志，问他们读了没有、谈了几遍，有什么体会、有什么认识或问题，并且会针对于同志们提出的问题逐个给予详细的解答。散会前他还指定下周期的学习内容，学习小组除了自学、互教互学外，也会请辅导员来辅导，如请艾思奇讲哲学，王学文讲经济学，杨松、吴亮平讲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等。当时的学习形式是以自主学习为主，每周集体讨论一次，学习的主要课程是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和毛泽东的哲学思想。

为了推进全党学习运动，延安时期成立了许多研究学习小组和研究会。这些研究小组和研究会定期分专题进行学术讨论，并承担起为干部教育培训教师以及编写教材的任务。由于学习方法得当、学习方式灵活，加之组织得力，通过这一阶段的学习，党员干部的政治思想觉悟和理论文化水平都有了明显的提高。

鏖战独树，为迎接中央红军北上奠定基础——红二十五军独树镇战斗纪念碑碑文敬读

□ 苗 壮

在河南省方城县城东北24公里处
的独树镇七里岗，巍然耸立着一座纪念碑。红二十五军独树镇战斗纪念碑采取虚实结合的空间构图法，形如刺刀，蕴含“鏖战”之意。碑身25.34米，蕴含红二十五军的番号和1934年的时代背景。碑面为花岗岩贴面，正面和背面分别镌刻着原党和国家领导人刘华清和程子华的题词，分别是：“红二十五军独树镇战斗遗址”“烈士精神不死”。在纪念碑正下方，烈刻碑文如下：

独树镇战斗纪念碑碑文
1934年11月16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2980余人，由军长程子华、政委吴焕先、副军长徐海东率领，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旗帜，自鄂豫皖苏区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开始长征。蒋介石急调30多个团围追堵截。26日午后一时许，红二十五军抵达独树镇七里岗，遭遇先期埋伏于此的敌四十军一一五旅和骑兵团猛烈攻击。是日，雨雪交加，先头团发现敌人较迟，没有战斗准备。加上战士们衣服单薄，手脚冻僵，一时拉不开枪栓，难以有效阻击强敌。危急时刻，吴焕先高呼：“共产党员跟我来”，手持大刀率队冲入敌阵，与敌展开白刃肉搏。全体将士浴血奋战，在北、东、西三面与敌殊死拼杀，战况空前惨烈。战斗胶着之际，徐海东率后卫部队赶到，立即向敌发起冲锋，经三次冲杀，打破敌人攻势，稳定了战局。激战中，近百名将士英勇献身，二百余人身负重伤。入夜，在与敌激战七个多小时后，红二十五军主动撤离阵地，在地下党和当地老乡带领下绕道穿越敌人防守空隙，突破重围，挺进伏牛山。

独树镇战斗，是红二十五军长征中生死攸关的一仗，红二十五军成功突破敌人围堵，对其完成战略转移，先期到达陕北，迎接党中央和主力红军北上并将革命的大本营建立在西北具有重要意义。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称这次战斗为“鏖战独树镇”，并与血战湘江、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

渡河、飞夺泸定桥、勇克包座、转战乌蒙山等著名战役战斗一起，成为红军长征八大经典战例。

独树鏖战，名垂青史，功昭后人，特立此碑，以志纪念。

中共方城县委员会
方城县人民政府
一九九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立
二零一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重修

碑文600余字，简洁凝练地叙述了红二十五军血战独树镇的战斗过程，阐释了这场战斗对红二十五军、对长征的重要意义和影响，彰显了红军英勇无畏的牺牲精神和英雄气概，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教育意义。

鏖战独树，孤军北上 做先锋

在远离党中央的情况下，红二十五军孤军远征长达10个月，最先到达陕北，为三大主力红军会师作出了历史性贡献。1934年11月11日，按照党中央指示，红二十五军对部队进行“打远游击，创建新苏区”的政治动员和轻装整编。整编后的红二十五军辖4个团，共计2980余人。16日，在军长程子华、政委吴焕先、副军长徐海东的率领下，红二十五军高举“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帜，从罗山县何家冲出发，离开鄂豫皖根据地，开始长征。我军采取声东击西战术，向伏牛山前进，但敌军判断出我军意图，急忙调整部署，计划在独树镇七里岗一带进行截击。

独树镇七里岗，是进入伏牛山区的必经之路。这里地势平坦，许南公路将七里岗拦腰截断，路基下降十几米，形成一个人工地堑，敌人早已设好埋伏。因天气恶劣，能见度低，再加上大多数战士当时年龄只有十几岁，战斗经验不足，先头部队没有发现敌情。11月26日下午1时许，部队向前推进时，埋伏在公路两侧的敌军突然发起猛烈进攻，红二十五军几乎完全暴露在敌人的火力之下。由于天气寒冷，很多红军战士的手被冻僵，

拉不开枪栓，零星火力不能有效地反击敌人，部队处境十分被动。

在这千钧一发的紧要关头，红二十五军政委吴焕先冲到最前线，下达命令：“坚决顶住敌人，决不退！”他抽出大刀，振臂高呼：“共产党员跟我来！”抢先冲上去和敌人展开白刃战。在政委的带动下，指战员们奋不顾身冲上前去。整整一个下午，红二十五军打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在徐海东率后卫部队赶来加入战斗后终于稳住了战局。红军作战勇敢，不少战士牺牲的时候，还死死地抱住敌人的尸体。天黑以后，红二十五军决定连夜突围，当地党组织主动清缴，带着部队走出了敌人的包围圈，迅速挺进伏牛山区，终于转危为安。

英雄不朽,红色精神 永相传

敬读碑文，红二十五军的光辉事迹不仅给我们留下了永恒的记忆，同时也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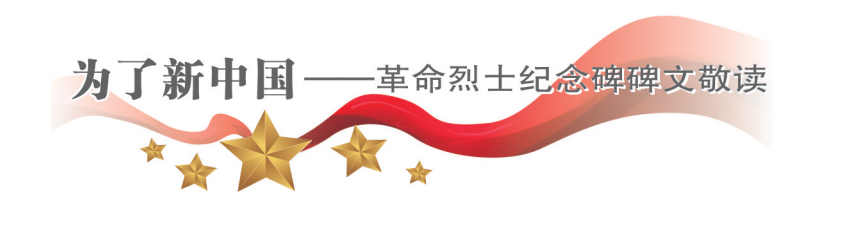
一是坚定革命理想、坚守使命担当。在党的坚强领导下，红二十五军逐渐成长为具有坚定革命信念和坚强党性的人民军队，成长为一支英勇顽强，敢于打硬仗、打恶仗的英雄部队。这支从血战中冲杀出来的英雄部队孤军北上，勇做先锋，先期到达陕甘革命根据地，为迎接党中央及三大主力红军到达陕北做了必要的准备，为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在陕北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是不畏艰难险阻、不惧牺牲一切。在这场关系到全军生死存亡的战斗中，全体共产党员在关键时刻奋勇当先，带领全军顽强战斗，以不足3000人的兵力挫败了国民党数万步骑



兵的猛烈合击，彻底粉碎了蒋介石妄图将其围歼于远征途中的阴谋。时任红二十五军政治部科长的刘华清回忆：这次战斗关系全军的生死存亡，在两军狭路相逢之际，红二十五军作为具有顽强战斗作风的勇者，以压倒一切敌人的英雄气概而立于不败之地，充分显示了红二十五军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

三是紧紧依靠人民，站稳人民立场。不论多么困难，红二十五军始终用实际行动宣传教育群众，扩大红军的政治影响。红军战士艰苦朴素、克己奉公、关心群众和密切联系群众的高尚风格，在群众中传为佳话，沿途老百姓说：“红军真是仁义之师，将来必有天下！”红二十五军的长征，在沿途播下了革命火种，扩大了党和红军的影响，使党深深地扎根于人民之中。



“事事关心天地间”的党报人邓拓

□ 张 寅

从1938年进入《抗敌报》从事党的新闻工作，到1958年离开《人民日报》，邓拓“笔走龙蛇二十年”，在党报的发展史上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投笔从戎 “征蹄南北又西东”

1912年2月26日，邓拓出生于福建省闽侯县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7岁时，他从福建省立第一高中毕业，考入上海光华大学政治法律系。1930年冬天，邓拓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二年夏，他转入上海政法学院，在社会经济系就读，并积极参加党的地下活动。1932年12月，邓拓在参加中共法南区委组织的纪念广州起义五周年活动时被国民党逮捕。在狱中遭受严刑的邓拓，虽得了肺病，但始终保持斗争之心。出狱后，邓拓积极参加革命。1933年，他在《新中华》杂志上发表哲学论文《形式逻辑还是辩证法》，与质疑辩证法的张东荪展开辩论。

1934年秋，他到河南开封投奔大哥邓伯宇，在河南大学法学院经济系插班。邓拓的毕业论文是《论中国救荒问题》，在撰写毕业论文的同时，应商务印书馆之约，邓拓完成学术专著《中国救荒史》，对历史上的救荒政策进行了深刻反思。1937年11月，这部用文言文写成的25万字的专著在商务印书馆出版，成为中国第一部救荒史论著。邓拓秉持问题意识，对“防止灾害”“挽救灾害”等问题进行了有益的学术思考，其中彰显的调查研究意识，为后来“走出报社写评论”等新闻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七事变后，邓拓给身在乡家的父母写了一首《寄语故园》的诗，用

“寄语故园双老道，征蹄南北又西东”的诗句，表达了投笔从戎的人生选择。1937年9月，邓拓奔赴晋察冀根据地，开始新的革命生涯。

游击办报 “边区抗战有微劳”

1938年4月起，邓拓担任中共晋察冀边区机关报《抗敌报》编辑部主任，撰写了大量号召抗战的评论。1940年，邓拓组织报道百团大战，他不仅派出精干力量报道前线战情，还亲自撰写《发扬百团大战与边区子弟兵的伟大胜利》《庆祝百团大战的胜利，继续百团大战的精神》等社论，鼓舞边区人民。1940年11月，《抗敌报》改名为《晋察冀日报》，邓拓担任报社社长、总编辑，兼任新华社晋察冀总分社社长。

游击办报是抗日战争时期边区办报的一个突出特点。面对日寇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扫荡”，邓拓带领报社队伍翻山渡河，在一个个小山村坚持办报。邓拓在1940年为陪伴他的马儿写过一首题为《咏黑鹰》的诗，其中“风雨奔驰应无憾，边区抗战有微劳”的诗句虽是咏马，亦是他游击办报生涯的真实写照。在1943年的一次突围中，这匹黑鹰不幸中弹死亡，邓拓痛心不已。

邓拓从丰富的办报经验中总结发展党报理论。“党的领导”和“群众路线”是邓拓论述党报理论的重要内容。关于“党的领导”，《论党报与党的工作》（1938年12月24日）阐述了党报是“党的生活和党的工作中的重要环节”，《贯彻全党办报的方针》（1944年4月22日）指明了各级党委

“要善于利用党报来指导工作”，《再论如何提高一步》（1945年7月14日）分析了党要亲自抓党报工作的重要性。关于“为人民服务”，邓拓指出，报纸不仅要“有群众内容”“群众形式”，还要坚持“群众写作”。他始终坚持把党性原则放在第一位，这是与自由主义报人的不同之处。

邓拓还是最早选编《毛泽东选集》的人。《毛泽东选集》的出版，是传播党的理论的有益探索。1938年，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邓拓安排晋察冀日报社以“七七出版社”的名义，刊印发行了这篇重要文章。此后，毛泽东有一新作，晋察冀日报社都会出版单行本。

燕山夜话 “事事关心天地间”

1948年，《晋察冀日报》与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合并为中共华北局领导的《人民日报》，邓拓调任华北局政策研究室主任。1949年2月2日，北平版《人民日报》创刊。4日，邓拓撰写的创刊社论《为建设人民民主的新北平而奋斗》登于报纸头版，此文由时任北平市委书记的彭真亲自修订。社论指出：“我们愿与北平二百余万人民在一起，向着毛主席所指示的方向，动员我们的一切力量，共同为建设新民主主义的北平而奋斗。”

1949年8月1日，《人民日报》被确立为中共中央机关报，邓拓出任人民日报社总编辑，并继续兼任北平市委宣传部部长。1952年1月，邓拓兼任人民日报社社长和总编辑，全面负责党中央机关报的工作。

邓拓十分重视调查研究。他反对

“关门办报”，强调要加强同群众的联系，提倡“简明的、科学的、生动的文风”。1949年，《人民日报》的发行量只有8万多份；到了1955年，这个数字就变为55万份。

1956年7月，邓拓主持《人民日报》改版工作。他在《关于报纸的社论》中指出，“社论是表明报纸的政治面目的旗帜，报纸必须有社论才具有完全的政治价值”，这充分地体现了他“政治家办报”的意识。邓拓到人民日报社后，新闻评论工作有了明显改进。此前，凡遇到重大问题，除中央领导人直接发言外，《人民日报》多数使用新华社评论。但到开国大典之后，所有重要的社论都由《人民日报》来承担。邓拓撰写的社论中，有40多篇是由毛泽东亲自签发的。

1958年，邓拓调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分管思想文教工作，兼任北京市委理论刊物《前线》主编。虽然他在宣传管理岗位，但仍心系具体业务工作，在《江南吟草·过东林书院》一诗中，他深切地表达了“事事关心天地间”的报人情怀。1961年3月，49岁的邓拓以马南邨的笔名为《北京晚报》“燕山夜话”专栏撰写杂文。“燕山夜话”首篇《生命的三分之一》中说，“古来一切有成就的人，都很严肃地对待自己的生命，当他活着一天，总要尽量多劳动、多工作、多学习”，这何尝不是邓拓的人生态度。

邓拓的一生，与党的新闻事业紧密相连。他始终用笔诠释着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正如他在《谈我们的报纸和报纸工作》（1951年）中所指出的：“我们的报纸必须具有明确的党性。它和人民性、民族性是一致的。”